

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西鹏

「送教上门」为中外海外员工培训中文

由华侨大学合作举办的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印尼员工线上短期中文速成班、厦门梦加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员工中文能力提升语言服务项目,近期相继结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西鹏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送教上门”为中国企业海外员工培训中文,是华侨大学发挥国家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作用、助力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实践。

根据海外员工的学习特点,华侨大学制定极具针对性的授课计划和授课内容,从认读汉语拼音开始,帮助学员在数月时间内快速提升中文水平。

“华侨大学创办于‘海丝’起点城市泉州,在‘海丝’支点城市厦门设立校区,拥有丰富的海外华侨华人资源。”徐西鹏说。

在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下,华侨大学立足地缘优势,在英才培育、学术研究、决策服务、高端培训、文化交流等方面发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平台。

近十年来,华侨大学成立中国首家“一带一路”高校智库——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举办“中马‘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中泰战略研讨会”,组织前往多个沿线国家开展实地调研,出版《海丝蓝皮书》《华侨华人蓝皮书》等,为政商学界推进、参与和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库参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华侨大学也举办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安哥拉政府青年科技人才班、“一带一路”贸易畅通高级研修班,在泰国、菲律宾设立孔子学院,打造“华文星火”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志愿服务团、留学生“主播”团队,致力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的友好使者。

自201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海外华文教育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一直是徐西鹏关注的重点。

针对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难题,徐西鹏称,华侨大学正着力办好华文教育专业,推进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和国家语言服务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承办丝路华教海外师资研修班、海外华文校长研习班、中华文化大乐园等项目,助力海外华文教师队伍建设和开发面向不同群体的海外华文教材、中华文化读本,研发有针对性的线上线下课程资源,丰富华文教育内容供给。

“我们更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海外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徐西鹏告诉记者,去年12月底,由华侨大学研发的“华文教育机器人”顺利“出海”,走进了菲律宾多所华校,缓解了海外华文教师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努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更多适应海外当地需要的华文教育智能化产品,助力海外华文教育提质增效。”

徐西鹏建议,发挥华文教育优势,“以侨为桥”,不断扩大“朋友圈”,推动跨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发挥华侨华人研究和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优势,推进“一带一路”前沿课题研究。(来源:中新社)



丹麦能源署组团访华前学汉字 了解中华文化

3月1日,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哥本哈根雅集——汉字书法”,邀请丹麦能源署十几位嘉宾体验中国汉字书法。

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文首先向来宾介绍了汉字的起源和演化及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影响。他还解释了“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人关于“依顺大自然的韵律而生息”的重要生活价值,介绍当今中国关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理念。随后,嘉宾练习毛笔书法,学写“天人合一”和自己的姓名。

据了解,丹麦能源署长期与中国保持合作,即将组团访华,与中方对应机构展开新一轮合作。嘉宾们兴致高昂,表示能在行前体验汉字书法,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对之后的中国之行和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十分有益。(来源: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

钱穆十论中国文化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际。

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一时间,对国家命运、民族未来、文化前途的悲观情绪弥漫开来。彼一时,公开著书坚信中国必胜的,除了发表《论持久战》的毛泽东外,还有学者钱穆。

全面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

《国史大纲》开篇扉页上,他写下,“本书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国史大纲》中处处可见作者忧患之情,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有人整本抄录,抄着抄着就泣不成声。时评人写道,这本教材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读之无不热血沸腾。

在完成《国史大纲》后,钱穆开始着手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思考绵延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前途。

阅读中国历史,不仅要探寻到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要在历史背后寻找到中国文化的根本性命题和特质,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和自信。《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这对姊妹书著作,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思考。今天我们分享钱穆在书中的10段话,一起阅读收藏。

1.人类文化的三大类型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

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雇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骸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象而祈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祿永终”。

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

2.中国: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

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袭而发展不辍。

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定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

3.中西方的历史观

西方人看历史,常偏向于“空间”的与“权力”的“向外伸展”;中国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赓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中国人的看法,只有自我一体浑然存在。双方历史形态之不同,以及双方对于历史观念之不同,其后面便透露出双方文化意识上之不同。

4.中西双方对于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异同

“自由”一词是西方人向来最重视的。西方全部历史,他们说,即是一部人类自由的发展史。西方全部文化,他们说,即是一部人类发展自由的文化。“人生”“历史”和“文化”,本来只是一事,在西方只要说到“自由”,便把这三方面都提纲挈领的总会在一处了。在中国则似乎始终并不注重“自由”这个词。

中国人一向在农业文化中生长,自我安定,不须向外寻求,因此中国人一向注重向内看,注重在时间方面看,便不见有严重的两体对立,因此中国人也不很重视自由,又不重视联合了。中国人因为常偏向于向内看的缘故,看人生和社会只是浑然整然的一体。这个浑然整然的一体之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则是各自的小我。“小我”与“大自然”混然一体,这便是中国人所谓的“天人合一”。

5.中西双方的宗教信仰

西方人常看世界是两体对立的,在宗教上也有一个“天国”和“人世”的对立。在中国人观念里,则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人不看重并亦不信有另外一个天国,因此中国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生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要求不朽,也只想不朽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古代所传

诵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从这种观念下产生。中国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业、教训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中国人不想超世界超社会之外,还有一个天国。因此在西方发展为宗教的,在中国只发展成“伦理”。

6.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

中国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干逐段纳入许多支流小水而汇成一大流的。在历史上约略可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上古迄于先秦。这是中国民族融和统一的最先基业之完成。在此期内,中国民族即以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许多别的部族,如古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而融和形成一个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秦、汉时代之中国人了。亦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秦、汉时代之全盛。

第二期:自秦、汉迄于南北朝。在此期内,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流里,又容汇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氏、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时代的中国人了。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时代之全盛。

第三期:自隋、唐迄于元末。在此期内,尤其在隋、唐以后,又在中国民族里汇进许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类,而再进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国人。这里第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间代之全盛。

第四期:直自满洲人关于现代,在中国民族里又继续融和了许多新流,如满洲、羌、藏、回部、苗等,此种趋势,尚未达到一止境。这一个民族融和之成功,无疑的又将为中国另一全盛时期之先兆。(上)(来源:商务印书馆)